

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伟大时代造就人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人才工作成就作出全面阐释——

“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高度，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大地正在成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明方向 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2021年9月27日至28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时隔11年后，党中央召开的又一次人才工作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下转第二版）

2022年8月22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今日12版

农历壬寅年七月廿五

经济日报社出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 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 1-68 第14280期 (总14853期)

## 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度探析(10)

□ 本报调研组

# 把握防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

##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防风险”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提及的高频词，每每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议题并论，处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体现出我们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与发展大势的敏锐洞察，也为全党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列出了重要的必修课。

### 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新的课题

立足新发展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全新课题。这既源自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目标等新情况，又表现为风险本身的变化、演进、传染、蔓延等新特征，还体现为对风险防范、化解、阻断、止损各项工作的新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特征新要求，也必然要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以新战略来解决新矛盾。

所谓“新”，最直接的表现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相应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多极化趋势明显。变革之中冲突加剧，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许多国家内顾倾向明显，甚至重拾冷战思维。世纪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全球生产和贸易面临变局，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经济领域的竞争延伸至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各领域，战争、能源危机等极端风险逐步从区域性走向全球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清醒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总体上看“顺风顺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但要破除自身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拦路虎”，还要

全力应对有可能“逆风逆水”的一段航程，必然会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

所谓“新”，最大的变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科学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面对科技革命引发的变革契机，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质的突破，用好了就能催生新的发展动能，用不好就可能为未知风险的累积和蔓延提供“温床”。比如，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能力，但如何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形成的新风险、如何把握使用新科技的范围和程度，仍然是业界争论的焦点。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两分法”，不能无视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也必须对那些扑面而来的未知风险保持警惕。

所谓“新”，最显著的特征是风险的系统化、全球化蔓延态势凸显。纵观新世纪以来，点上风险系统化、局部危机全球化的态势愈发明显。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蔓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跨度之大、叠加效应之强、破坏性之猛烈都前所未有。特别是疫情席卷了整个人类世界，对社会治理、生产组织、利益分配、政治格局、创新方向乃至思想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情况新趋势，都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简言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个“新”，就难以深刻理解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难以在不稳定性持续增加的世界中谋求稳定的发展，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难以高质量制定政策、高水平执行政策，甚至有可能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制造出新的风险。

### 消除模糊认识，处理好重大平衡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科学研判发展机遇与挑战，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防风险”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正是预见到了重大风险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党中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知模糊问题，特别是对“统筹”方法论的认识不足。这可能造成政策出台上的“挤碰头”、执行上的紊乱和不到位，也可能出现因短期暂时波动而影响长期战略实施等现象。比如，对已经识别出的风险，虽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表面上的“易爆点”，但形成风险的深层次矛盾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风险点就会层出不穷；对一些已经暴露的风险点的成因、特征和演化趋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做不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很可能造成“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的后果；对一些风险的关联性认识不深，目光只停留于一时一地，缺乏大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在操作容易引发次生风险……这些问题不解决，风险势必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葫芦浮起瓢”，工作上缺乏整体性、连续性、稳定性，疲于奔命四处救火却抓不到根子。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更好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实践。

——明确价值原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治国常有，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特别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处于作出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如何考量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只要坚持从这个价值原点出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厘清逻辑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始终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发展是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持续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从长期看，发展和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一般经济学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我们在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识，也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逻辑。

明确了价值原点，厘清了逻辑框架，还要认识和处理好一些重大平衡关系。

例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依靠政府力量，会损失资源配置效率，丧失经济活力，出现政府失灵；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会催生过度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出现市场失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权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争论贯穿百年、经久不衰。西方国家认识这一重大关系的“钟摆”在政府与市场两端反复摇摆，一朝碰壁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就会“摆荡”回另一端。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效弥补了西方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认识上的缺陷，也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引。当前人们高度关注的经济结构失衡、地方债务高企、各领域政策“挤碰头”等，从根子上梳理，都源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因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不到位。必须要既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扬长避短、有机结合，作用都能得到有效发挥，才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不断化解前期风险、不累积新的风险，也更有余地余力应对突如其来的极端情况。

再如，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论是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还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追根溯源，都起因于实体经济的内部结构失衡、外部竞争力下降，是实体经济扭曲体现到金融领域的危机大爆发。（下转第二版）

## 经济论坛

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1.61亿户，较2021年底增长4.4%。单看这一数据，虽比不上前两年的增速亮眼，但结合今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才能读懂这个成绩的弥足珍贵、来之不易。

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增长7.5%，已接近新冠肺炎疫情前的增速，但4月份受超预期因素影响增速出现下跌；在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作用下，5月增速恢复至1.4%；随着疫情的稳定控制和信心的恢复，6月增速回升至19.7%。

4月份国内疫情频发，业内预计市场主体会遇到经营困难，但当月数据之低迷还是“超预期”；设想6月份市场主体增速会反弹，但没想到能反弹到这么高。这个短暂下跌又极速拉升的V字形走势，显示出中国经济有极强的韧性，也说明中央一系列稳市场主体、稳经济大盘政策的及时给力。

数据里还有两个重要信息，可以为今后的政策发力点提供参考。

一是当前应在帮扶企业的同时，下大力气扶持个体工商户。前6月，全国新设企业同比下降，但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8.0%，将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的总量拉起来，实现同比增长4.3%。这些街头巷尾的小餐馆、理发店、小店铺，看似不起眼，却发挥着吸纳和稳定就业、活跃市场、服务民生的重要作用。同时，个体户“船小好调头”，在不确定性较强的时候，依然能带动城乡基层人员扩大就业、积极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企业，个体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此前出台的帮扶措施又主要针对企业，个体户仍面临政策获得感不强、流动性不足、成本上涨、融资难等问题。相关部门需聚焦个体户纾困解难和长远发展，深入研究分型分类帮扶。

二是应加快研究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的规律特点，为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上半年新设新业态市场主体增长较快，增幅明显高于总体水平；全国新设“四新经济”企业229.7万户，占新设企业总数的54.2%。把“四新经济”发展的势能，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需在政策环境方面进行更多探索与突破。

市场主体稳，经济和就业才能稳。目前市场主体已经出现回稳势头，应当抓住经济恢复重要窗口期，继续高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齐心协力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基础，让这波反弹的高点变成经济运行回归正常轨道的新起点。

## 导读

|              |     |
|--------------|-----|
| 专项债券要用在刀刃上   | 5版  |
| “迷你基金”不宜一清了之 | 7版  |
| 消费者“买出”新蓝海   | 8版  |
| 老园区如何“腾”出新天地 | 9版  |
| 当国风遇上港潮      | 12版 |



行数量达一万亿  
八月二十一今年已有近900家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较去年提前十天破万亿  
中欧班列

—西安至汉堡

—从西安国际港站发出

开出

今年以来

唐振江

摄 中欧班列

—中视视觉

# A股为何出现回购潮

本报记者 马春阳

施股份回购的公司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电子与计算机3个行业，总数量近300家，占比超过三成。

对于行业相对集中的现象，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表示，首先，这些行业今年以来跌幅较大，回购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其次，这些行业属于科技含量高、技术壁垒高的行业，上市公司需通过回购股份进行股权激励等强化公司与核心团队、核心技术人员的绑定，提升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认为，回购对于上市企业而言，可以优化其资本结构、提升企业价值，降低上市公司股东面临的代理人成本问题、降低恶意收购风险等。

### 监管层持续鼓励回购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A股市场呈现明显震荡走势。为此，监管层面多次释放信号，并出台相应政策，引导鼓励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增持，促进市场稳定。

4月11日，证监会、国资委、全国工商联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提到，鼓励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5月份，沪深交易所也明确支持股份回购。上交所提出，研究推动上市公司回购、增持等稳市行为便利化，继续支持鼓励资管机构、人员自购，配合做好长期投资者入市工作。

持续推动产业资本积极回购对于上市公司自身、投资者，乃至整个资本市场都具有积极意义。董忠云分析，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回购可以向市场传达公司经营和现金流相关的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对于投资者来讲，上市公司回购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改善，间接提升投资价值；对于资本市场来讲，上市公司常态化回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产业资本的动向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而言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李求索认为，一是可以反映公司内部对上市公司仍有信心；二是部分公司的回购增持行为，目的可能包括主动提振持股人信心；三是某一行业出现集中回购增持，反映出对行业发展前景的看好。

### 强化上市公司回购功能

从上市公司给出的股份回购目的来

看，今年已实施回购的公司大部分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其他则多用于注销、市值管理、盈利补偿等目的。整体来看，回购股份的运用较为多元化。

“股份回购一般出于稳定公司股价、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优化利润分配、降低恶意收购风险等目的。”田轩表示，回购本身已经向市场传达积极信号，企业可以自主决策回购用途，这也是市场化机制的客观需要。投资者应该预防那些借回购名义变相减持、未合理评估公司长期发展价值或者回购后故意披露低公司业绩等风险事项。

尽管近年来A股市场股份回购已愈发常见，但业内人士认为，相比成熟发达市场，当前A股市场回购规模仍然较小，上市公司回购回购功能发挥以及推广应用，未来依然具备较大发展空间。

“应当放宽股票回购条件以及比例，为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拓宽渠道；加强对信息披露以及交易行为的监管，规范上市公司回购行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回购制度。”光大证券首席分析师王一峰建议。

田轩认为，要真正发挥好股份回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大力推动A股市场回购规模增长，并配备成熟的法律与制度保障。比如，健全回购规则体系，细化股份回购适用条件，禁止盲目回购情形；完善股份回购法律体系，提升监管引导，强化信息披露，加强违法惩戒，进一步提高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成本。